

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①

朱悦梅

内容提要：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军事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攻略西域的军区由四道节度（khrom）组成，与其河西、关陇、川康、西洱河等战区相平行。节度之下的基层军事建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给养方式则出现分配土地、资财登记造册、军粮统一发放等形式，相应地引发职官体系及其职能的调整。

关键词：吐蕃 军事建制 职官制度 四道节度 萨毗节度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4—0018—09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吐蕃势力开始介入西域地区，经过与唐、大食的争夺，特别在唐朝安史之乱后，逐渐占领塔里木盆地南缘广大地区，一度建立了其在青藏高原以外的军事领地。由于西域绿洲邦国与吐蕃本土在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生产方式、区域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差异较明显，吐蕃军事力量在新环境下的生存条件、生活环境、管理模式、建制体系等较之在本土时的军事部落联盟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关于吐蕃在西域地区的职官体系及其管理制度，前贤有不少富有成就的研究，特别是王尧、陈践、F·W·托玛斯等中外藏学家对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的刊布与释读，推动了对西域敦煌社会历史进行全方位讨论的热潮。张云先生对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制度体系进行过系统的论述^②，还利用新疆出土藏文文献，整理出吐蕃在西域时期的职官计44种，对吐蕃的职官制度，从早期的部落特征到后来的职官系列，做了详细梳理。^③王欣根据西域出土古藏文文献载录的信息，探讨了吐蕃在西域驿站的运行体制。^④此外，陆离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军事、畜牧业等职官进行了细致研究，^⑤杨铭、何宁生等对吐蕃统治敦煌及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吐蕃王朝职官管理制度研究”（批准号09BZS039）、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唐代吐蕃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批准号09XB07）的阶段性成果。

② 张云《唐代吐蕃统治西域的各项制度》，《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③ 张云《新疆藏文简牍所见吐蕃职官考述》，《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④ 王欣《吐蕃驿站制度在西域的实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⑤ 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军事、畜牧业职官二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职官四题》，《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西域的基层兵制及西域古藏文写本中所见的部分吐蕃官吏做过详考。^① 伊朗学者施杰我 (Prods Oktor Skjaervo) 释读了部分于阗文文献, 反映出吐蕃对于阗与敦煌之间关系的控制。^② 日本学者武绍内人利用西域出土木简, 讨论了吐蕃在西域军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③ 这些成果对复原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政体系及其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并为研究吐蕃占领区管理模式、建制体系及其特征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与吐蕃早期军事构架的渊源, 其在吐蕃军事扩张战略中的地位, 以及西域绿洲地理环境对吐蕃军事建制的影响等, 从而梳理出吐蕃军事力量离开本土后, 在新的地理环境下军事建制的地域性特征。

一、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及其基础

如所周知, 吐蕃于西域占领地区所设置的较高级别的军事机构为 khrom,^④ 其职掌可与唐朝的节度使、节度衙相对应。吐蕃在西域地区所设置的 khrom, 目前从文献中可找出四个——萨毗节度 (tshal - byi)^⑤、领属地区夷琼节儿节度 (dbyild - sung - rtse - khrom)^⑥、吉尔吉特节度 (bru

- ① 杨铭、何宁生 《曹 (Tshar) ——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 《西域研究》1995 年第 4 期; 杨铭 《新刊西域古藏语写本所见的吐蕃官吏研究》, 《中国藏学》2006 年第 3 期。
- ② Prods Oktor Skjaervo , *Iranians , Indians , Chinese and Tibetans: The Rulers and Ruled of Khotan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 in Susan Whitfield (ed.) , *The Silk Road: Trade , Travel , War and Faith* , A British Library exhibition on the Asian Trade Route Known as the Silk Road Opened on 7 May , London 2004 , pp. 36 - 42.
- ③ Tsuguhito Takeuchi , *The Tibetan Military System and its Activities from Khotan to Lop - Nor* , in Susan Whitfield (ed.) , *The Silk Road: Trade , Travel , War and Faith* , London 2004 , pp. 50 - 56.
- ④ 学界关于 khrom 的认识在不断地探讨中渐渐清晰, 最早匈牙利学者乌瑞释之为“军镇、军衙”(military government) , 文见 Géza Uray ,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 - 9th Centuries* , Michael Aris & Aung san Suu Kyi (eds.) ,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 Oxford 1979 , Westminster: Aris & Phillips , London 1980 , pp. 310 - 318. 汉译文见沈卫荣译: 《释 KHRUM: 七—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131 ~ 138 页; 荣新江译 《KHRUM (军镇): 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 《西北史地》1986 年第 4 期。杨铭先生译作“节度使”(杨铭 《唐代吐蕃统治鄯善的若干问题》, 《新疆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日本学者山口瑞凤译为“军团”(《以沙州汉人构成的吐蕃二军团的成立与 mkhartsan 军团的位置》, 《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纪要》1981 年第 4 期, 汉译文见易明译 《沙州汉人二军事部落的成立》, 《国外藏学动态》第 2 期, 1987 年)。王尧、陈践先生解释为“行军衙”、“将军”(《吐蕃兵制考——军事部落联盟剖析》, 《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马德先生指出此机构只出现在吐蕃新占领区(边境地区), 为依照唐制设置的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及委派的统治者, 可直译为“节度衙/节度使(都督府/都督)”(《KHRUM 词义考》, 《中国藏学》1992 年第 2 期)。
- ⑤ 乌瑞称其为“一个包括整个罗布泊地区的军事行政区”, 见氏著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 - 9th Centuries* , p. 318. 萨毗城, 据敦煌文书《寿昌县地境》记载, “在镇(指石城镇) 东南四百八十里, 其城康艳典置筑, 近萨毗驿。险, 恒有吐蕃土谷往来……已前城镇并没吐蕃, 亦是胡戍之地也。”
- ⑥ 见 M. Tāgh. a. v. 001 (见 F. W. Thomas ,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 II , London 1955 , p. 219) , 为设在于阗王国的佚名军事行政区, 由于文书残损严重, 乌瑞认为 dbyild 很可能是一个氏族名称, 因之未必能如托玛斯那样来命名其为 khrom (见 Géza Uray ,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 - 9th Centuries* , p. 318) ; 王尧、陈践先生将之译作夷琼堡寨军帐, (《吐蕃简牍综录》51 号, 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第 36 页), 本文从之。

- shavi - yul - gyi - khrom) ①和疏勒节度 (khri - bshos - khrom) ②。这四个吐蕃节度使, 构成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体系, 这套建制无疑是吐蕃在西域地区依其军事锋线的要求而设置的。那么, 这套军事建制体系与吐蕃的军事战略目标有什么关系? 在吐蕃对外扩张的整体军事战略中地位与作用如何? 要弄清这些问题, 则需追溯吐蕃西域战场的开辟与早期部落军事架构的关系。

吐蕃王朝成立之初, 其军事力量有一套架构体系, 即三大“勇部”——“三勇部”(dpav bvi sde gsum)、 “中勇部”(bar gyi dpav sde)、 “下勇部”(smad gyi dpav sde)。三大勇部的具体设置如下:

所谓“三勇部”, 是在昌达巴山 (ri brang stag pa) 以上、门地四柴卡 (mon dbral kha bzhi) 以下, 由没卢氏 (vbro)、琼氏 (gying)、噶尔氏 (mgar)、努氏 (snubs) 及年氏 (gnyan) 等所谓之“古、久等五部 (gug cog sde lang) 在此为官 (dpon byas) ……

所谓“中勇部”, 是在贝囊隆山 (ri pe nam lung) 以上、恰贡 (cha sgong) 及佩 (bas) 以下, 由“十二贝佳部” (sbas rgya sde bcu gnyis) 居此, 并任纳雪 (nags shod) 之官……

所谓“下勇部”在玛朋木热 (rma pom ra) 以下嘎塘陆茨 (ga thang klu tshe) 以上, 由“通乔九政权部” (mthong gyab sred sde dhu) 及吐谷浑六东岱 (va zha stong sde drig) 所据……③

由这段记载可知, 三大“勇部”相当于吐蕃赞普根据贵族势力的分布所划分的军事卫戍范围。其中的“中勇部”, 黄颢先生翻译《贤者喜宴》时加入译者按, 认为此部为负责攻取南诏 (ljang) 之部, 相应地, 下勇部为攻取汉地之部, ④此说颇有见地。以南诏为战略主攻目标的“中勇部”, 即“吐蕃中节度”的前身, 而“中勇部”演变为“中节度”正是吐蕃军事部落制向军事集团化、区域化转化的结果。⑤“下勇部”所在之玛朋木热即为大积石山, 在其以北的青海高原上, 生活着以通乔部和吐谷浑部为主的部落, 他们构成吐蕃对唐朝河湟、陇右、剑南一线的作战基础, 这一点从唐蕃间围绕河湟地区的争夺最早且最为持久可见一斑。

“三勇部”诸氏所居之地均在吐蕃五茹“十八区”⑥势力范围之内, 也就是吐蕃贵族势力的核心阶层, 特别是其主管者之一为著名的噶尔氏 (mgar), “源出于足末城, 吐蕃赞普之王族也”。⑦噶尔禄东赞是吐蕃王朝前期进攻吐谷浑与唐朝边境的主要指挥者, 作为吐蕃赞普的大相, 时常出现在吐蕃征伐吐谷浑的战场以及唐蕃交往的驿道上。“三勇部”无疑是吐蕃本土诸贵族势力集中的腹心地区, “三勇部”的设置, 一方面可构成保卫吐蕃赞普的主要卫戍力量, 同时也在吐蕃对唐朝的军事锋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 Géza Uray,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th - 9th Centuries*, p. 318.

② 王尧, 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民族出版社, 1980年, 第105页; 黄布凡, 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年, 藏文见第8~9页, 汉译文见第42~43页。

③ 巴卧·祖拉陈哇著; 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④ 巴卧·祖拉陈哇著; 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二)》。

⑤ 朱悦梅《吐蕃中节度考》, 《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⑥ 汉译文参见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二)》, 第8页。

⑦ 《张说之文集》卷十七, 《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间龙池草堂刻本。

吐蕃早在龙朔二年（662 年）即开始角逐中亚，《于阗国授记》记载，噶尔禄东赞的第五子勃论赞（blon btsan nyen，又有书作勃论赞刃者）于 686 至 689 年曾在于阗建立过寺院。^①如果与早期吐蕃军事部落联盟制时期的军事部署有联系的话，在“下勇部”与“中勇部”都有军事战略目标的情况下，不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战略格局讲，三大“勇部”中的“三勇部”作为针对西域战场的军事建制渊源，显然有一定的战略基础。

在攻占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之前，吐蕃首先征服孙波，即苏毗。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娘氏（myang）家族承担了这一重任，“娘·芒波杰尚囊发兵征讨苏毗诸部落，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不失所有户数，全纳入治下为庶民。”^②娘氏是吐蕃古老的家族之一，也是吐蕃贵族核心势力中的主要成员，《唐蕃会盟碑》北侧蕃官题名中“刑部尚书明论结研历赞”^③即是这一家庭的成员，另有《谐拉康碑》甲、乙二碑所记的娘·定埃增，是赞普幼年师保，后任钵阐布，也是权重一时的重量级人物。^④除娘氏家族和西域战场指挥者噶尔氏外，检西域出土古藏文简牍，派驻西域的吐蕃军事人员中出现的姓氏，还有没庐氏（vbroy）、属庐（chog）、木（smu，古代四大氏族之一）、那囊（sna - nam）、努（gnubs）、韦（dbas）、蔡邦（tshe - spong）等等。在这些姓氏中，没庐氏为“三勇部”主体部族“古、久等五部”（gug - cog - sde - lnga）之首，属庐、那囊、努、蔡邦诸氏，为吐蕃中心五茹十八区内之部族。^⑤从出现在西域的吐蕃部族姓氏看，与“三勇部”的势力范围几乎重合。

吐蕃在西域战场上的军事部署，与吐蕃在其本土“三勇部”——吐蕃贵族的核心势力有直接关系，在吐蕃军事扩张过程中，由过去的卫戍性军事体系转变为进攻性军事集团，建制体系渐至完善。如果这一推断不误，则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与其在河湟战场、川康地区针对唐剑南道的战场、西洱河地区的战场一起，构成了吐蕃向外军事扩张的战略格局。

汉文史籍对吐蕃与唐朝军队的军事交锋多有记载，在吐蕃向外扩张的总体部署中，西域是其征服象雄、苏毗之后进一步拓展的最重要战场，与此同时，吐蕃于贞观十二年（638 年）借故向唐太宗请婚未得应允而向唐朝发动进攻，兵锋第一次到达唐境岷江流域。到唐高宗乾封二年（667 年），已“尽破有诸羌羈縻十二州”^⑥。随后，围绕唐朝剑南道北部地区，吐蕃军事力量形成了“故洪等四节度”^⑦、“囊贡、腊城等九节度”^⑧等建制，由“吐蕃南道元帅”充任这一战场的总指挥。^⑨而在西洱河地区，吐蕃于其“中勇部”基础上建立的“吐蕃中节度”，实现对唐朝

① 见古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第 184 叶背面，总第 226 行。苏晋仁根据《于阗国授记》将勃论赞统治于阗的时间推定在 686 至 689 年间。

② 黄布凡，马德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 208 页。

③ 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 20 页。

④ 考论见王尧、陈践 《吐蕃简牍综录》，第 52 页，180 条注。

⑤ 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 《〈贤者喜宴〉摘译（二）》，第 8 页。

⑥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075 页。

⑦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08 页 《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年，第 11589 页上。

⑧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 5261 页。

⑨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载：（贞元）九年（793 年）“当是时，韦皋功最多，破堡壁五十余所，败其南道元帅论莽热没笼乞悉蕘”，第 6098～6099 页 《旧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亦载：贞元九年，“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破之，杀伤数千人，焚定廉故城”，第 5258 页。

剑南道南部地区的军事攻略。^①在河湟地区，著名的“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不断深入唐朝关陇地区。在吐蕃军队占领河西走廊之后，汉文史籍出现了“吐蕃北道节度使”，敦煌古藏文文献与汉文文献中也相继出现了 (m) khar tsan khrom (姑臧节度)^②与 mkhar tsan khrom chen po / khrom mkhar tsan po (姑臧节度使)、kwa cu khrom (瓜州节度) 与 kwa cu khrom chen po (瓜州节度使)^③。

综合吐蕃对唐军事战线的分布情况，西域战场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与“吐蕃东鄙五道节度”、“吐蕃北道河西节度”、“吐蕃中节度”、“吐蕃松州(南道)五节度”一样，属吐蕃对外扩张过程中分处不同区域战场的同一层级的建制，即一级大军区，林冠群先生给出了“吐蕃西道节度”^④这一贴切的建制称谓。而四个 khrom——萨毗节度 (tshal - byi)、领属地区夷琼节儿节度 (dbyild sung rtse khrom)、吉尔吉特节度 (bru shavi yul gyi khrom) 和疏勒节度 (khri bshos khrom)，则为吐蕃西域军区下设的四个军分区，为吐蕃军事力量在西域取得一定成果后，针对该区域内不同局部战场而分化出的若干路有具体军略目标的第二层级。据此，不妨效仿吐蕃在其他战场的军事建制命名方式，在林冠群先生之前命名的基础上，将吐蕃西域战场的军事建制暂称为“吐蕃西境四道节度”。

二、吐蕃在西域的基层军事建制及其军事地理特征

从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书所载内容，大致可以复原出吐蕃军事占领当地后的军事建制层级。这里拟从吐蕃驻西域基层军事建制中的斥候 (so)、坐哨 (ri zugi)、城镇守军 (mkar vtsho) 等军种及其相应的职掌内容入手，讨论西域地理环境对吐蕃军事建制的影响。据研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南道沿途之自然条件已经十分恶劣，所经绿洲大多局促于流沙的包围之中。^⑤1906年，英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掘出一批3世纪左右的佉卢文文书，保存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内容。在东汉明帝永明年间，鄯善兼并且末、精绝等小国之后，建立了疆域辽阔的鄯善王国，其疆域内有着完备的驿传制度。由此可知，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已形成了相互间联系的中继站。

吐蕃势力进驻后，首先要控制一个个被沙漠分割开来的绿洲，相应的军种配置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为维持绿洲安全及相互间的有效联系，于是斥候、坐哨等被大量设置。M. Tāgh. i. 0015 (托玛斯 II, 432 - 3): “娘茹巴 (nyam - ru - pag) 后卫 (后备?) 哨兵驻守河流汇合处的堤岸。”^⑥ M. Tāgh. 0522 (托玛斯 II, 432 - 3): “娘茹巴 (nyam - ru - pag) 后卫哨兵驻扎于雪

① 朱悦梅 《吐蕃中节度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王尧，陈践 《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③ P. 3770V2 《发愿文》中的“瓜州节度使论乞颊热渴支”，见杨富学、李吉和辑校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④ 林冠群 《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⑤ 黄盛璋 《绿洲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⑥ 托玛斯著；刘忠译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72页；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I, p. 432; 王尧、陈践先生译作“曲都河边有阿木茹巴之后备斥候。”见《吐蕃简牍综录》157号，第50页。

(*sho*) 河堤上。”^①这些斥候、哨所的设置,还与交通道路的控扼有关,特别是斥候,除前文已经提到的河口、河边往往是设置斥候的要点外,交通隘口也是斥候驻守的要点。如: M. I. i, 6 (托玛斯 II, 460-1) 载“下宗木部落虽已去倭那尔堡塞,隘口有斥候,及……十人。”^②

此外,绿洲国家早期就形成的驿传制度及其向导、护卫等兵种的设置,是沙漠绿洲自然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与交通道路体系相适应的军事防戍体系。吐蕃亦相当重视驿传,所不同的是,古鄯善国的护卫所承担的是防盗与沿途的转乘与补给,而吐蕃时期的斥候和坐哨所要担负的除驿传外还有军事防御方面的内容,因此,斥候常常与驿站相结合。关于此学者早有注意,甚至认为驿站的增加就意味着吐蕃势力的扩张和对当地统治的加强。^③这种以道路交通为主要控制对象的特点在西域吐蕃文书中有不少反映。如: M. I. xiv, 005 (托玛斯 II, 433-2): “虾蟆山四名斥候一个驿站,龙年夏季五月初六日派出斥候之木牍。”^④ M. Tāgh. a. iii. 0016 (托玛斯 II, 202): “山上斥候请我驿吏及寮属助理二人向论当列大人报告,口粮已尽……”^⑤

斥候与驿站的驿吏一样,也担任驿递的任务,这在出土木简中已有反映,而斥候的驻扎点与驿站相结合,更能说明吐蕃军事力量对交通线路的重视。斥候、坐哨等基层军事建制较吐蕃常规军事事务而言带有了绿洲特征,与城镇守军一起形成绿洲城邦和卫戍及之间交通关联的层级管理体系。这种较为完备的绿洲防御体系,与吐蕃王朝以部落为单位的编制的体制相比较,则新的驻防体系更显示出化整为零的特点,这是沙漠绿洲地理特征对吐蕃部落制军事结构制约的结果。

此外,吐蕃本土贵族进行民事管理的堡寨(*rtse*)也被移植到了西域。西域出土古藏文文献表明,在吐蕃占领西域的诸多地区多有堡寨的设置,如“领属区堡寨”(mngav - ris - byin - gyi - rtse, 见 M. Tāgh. 0016, 托玛斯 II, 221-1, 《综录》47^⑥); “门城子堡寨”(mon - rtse, 见 M. Tāgh. a. ii. 0058, 托玛斯 II, 221-3, 《综录》48); “袞囊堡寨”(kun - snang - rtse, 见 M. Tāgh. i. 0020, 托玛斯 II, 220-1, 《综录》49); “夷琼堡寨”(dbyild - cung - rtse, 见 M. Tāgh. a. v. 001, 托玛斯 II, 219-3, 《综录》51; M. Tāgh. a. vi. 006, 托玛斯 II, 219-2, 《综录》52) 等。堡寨是一种建筑在山巅的城堡,巍峨挺拔,牢不可摧,是一方贵族领地最高统治的象征,今天的西藏还保留着诸如江孜宗堡、日喀则桑珠孜宗堡等的山顶城堡古迹。堡寨为部落首领的驻地,部落贵族首领在这里实施他对领地的全权管理,而到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王朝之后,军事外交由王朝统一管理,堡寨则成为以地域相分隔,以聚落、部落为单位的部落贵族在领地内实施民事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因其以部落制为基础,而带有家族特征,在以堡寨为中心的贵族领地中,社会组织通常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集体生活。堡寨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军事部落制体系当中,更多地带有民事权力机构的色彩。上列诸多

① 托玛斯著,刘忠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72页;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I, p. 433.

②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188号,第53页。

③ 王欣《吐蕃驿站制度在西域的实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④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144号,第49页。

⑤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330号,第64页。

⑥ 托玛斯 II, 指 *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I, 数字表示所释录之简牍所在之页码。《综录》指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其后的数字表示该书简牍编号。本文所引简牍资料,均按此例,不再一一作注。

的堡垒，大多地望已不可考，但如此众多的行政机构的存在，表明在西域战场吐蕃在其部落军事联盟制的基础上，配置有军事的和民事的职官建制体系。

三、绿洲农业地理对吐蕃军队补给制度的影响

吐蕃驻足西域后，为维持长期统治之需，在给养上亦不得不在部落军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首先，因军事部落群牧方式无法维系，出现了向绿洲城邦市易方式的过渡。吐蕃初攻西域时，军队的补给还是一如既往的大规模部落整体性迁移，就如《新唐书·吐蕃传》所记载的：

〔开元〕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都护图之。”孝嵩听许，遣疏勒副使张思礼以步骑四千昼夜驰，与谨忙兵夹击吐蕃，死者数万，多取铠仗、马羊，复九城故地。^①

“死者数万”，且有大量的“铠仗、马羊”，分明这支部队不仅有士兵，还有牧养马羊的后勤人员（即士兵的家庭成员），如此大规模军队进入帕米尔高原，是吐蕃传统的部落整体性作战的模式。但是，西域的绿洲城邦并不能为这种群居群牧形式的配给方式提供足够的牧场，且吐蕃军事力量从本土抵西域进行远程作战，大规模后勤携带有诸多不便，于是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解决。

在吐蕃通西域的吐火罗路、羯师路上有羯师国^②，由于其地“在深山，恃其险阻，违背圣化，亲辅吐蕃，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于是，吐蕃“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箇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著羯师国过，其王遂爱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③ 箇失密（Kashmir），王治拨逻勿逻布逻城，在今印领克什米尔斯利那加（Srinagar）^④。吐蕃于羯师设镇军，而盐米则市于箇失密，就是因为吐蕃军队的军粮给养失去了依赖部落群畜的条件，转而以从当地周边地区通过市易购买的形式解决。

军事进攻期间的补给可以通过市易购买，而占领西域绿洲后，吐蕃人粮食来源主要通过征缴方式，甚至直接分配土地进行耕种，这些也构成对其早期军事部落制度下给养方式的补充。在西域出土的汉、藏文文书中，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帮助今人了解这种军事给养制度变化的脉络。

从古藏文文献记载看，吐蕃人以统治者身份向当地“属民”（vbangs）征缴粮草，而且征缴数量可观。古藏文木简 M. I. xxviii, 1（托玛斯 II, 3Q 《综录》61）记“吐谷浑上部万人部落，凡属唐所辖者，每户征收五升（青稞），万人部落田赋以六成计征，所征青稞混合堆置一处，一部分（青稞）如以羊驮运不完，可派牛运。”^⑤在米兰出土 M. I. lviii. 006（托玛斯 II, 161-2；《综录》28）还有税吏（khräl-pon）^⑥一职之名称。

西域的吐蕃人直接占有土地，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获得土地物产，这又可分为公有和私有两

①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第6083页。

② 羯师，《新唐书》中作“羯师”，其地望学界意见分歧。详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1724页上。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下《箇失密传》，第6255~6256页。〔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217页注（一）。

⑤ 73 RMF 26: 16号木简，汉译见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12号，第28页。

⑥ 见 M. I. lviii. 006（托玛斯 II, 161-2，《综录》28）。

种土地耕种方式。其中,公有土地是规模开发的,由专门主管土地事务的“农田官”(zhing-pon)^①,有时还会派出军队来监督实施。如 M. I. xxiv, 0031 (托玛斯 II, 29 《综录》132) 藏文本简记“吐谷浑农夫被分派进行耕种时,要派出军队进行监视。”^②私有土地,则由吐蕃军事驻地管理机构分配一定份额的小块土地给予吐蕃军官,军官们得到这份土地是以租赁方式还是封授方式获得尚不清楚。^③但土地的耕种,有的由称作“农田佃奴”(chun-pa)^④的奴仆从事耕作;有的雇人耕作。这表明,具有统治者身份的吐蕃军人在绿洲邦国中转变为类似于中小贵族或军功贵族的地主,而土地也成为游牧贵族所要掠夺的战争财富中又一重要内容。

受农耕民族储备农产品生存方式的影响,吐蕃军事统治中出现了粮食储备及军粮分配的形式。古藏文文献中有若干与粮食领取有关的资料。M. Tāgh. 0574 (托玛斯 II, 226 - 1; 《综录》47) 载“从领属区节儿处领取青稞四升(之收条)。”所谓“领属区”,王尧、陈践先生有注云:原为通称,元代以后即专指阿里地区,即所谓“额里斯”。^⑤能够从领属区节儿处领取到粮食,则说明领属区的节儿掌管着一定的粮贮机构,可以为军队的作战人员提供军粮的保障。

与粮食储备相对应的是军粮分配。从吐蕃简牍可知,领取口粮(rgyags/brgyags)的军事人员有使者(pho-nya)^⑥、斥候(so)^⑦、坐哨(ri-zugi)^⑧。这种军粮的分配方式,与吐蕃军事部落的给养方式完全不同,即军粮的补给不是由部落士兵的家属或后来的所谓从军的奴来负责,而是由占领区军事机构提供保障。相应地,缴获物资开始登记造册,而不是部落制下出征军士缴获物品归自己享用。这种变化是绿洲自然地理条件较之青藏高原不同而引发的。

绿洲虽小,然土地肥沃,宜农宜牧,于是,吐蕃人到此后,除了对农业产品的占有,对牧场更为偏爱。据文献载录,绿洲中有专门的牧区,M. I. xiv. 119 (托玛斯 II, 354 - 2 《综录》76) 记:“……恩穷和卓赞所交之若干赋税粮食,往牧区送七克,作割草费……”吐蕃人还为牧场配置有长官,如 M. I. xlii. 006 (托玛斯 II, 445 - 2 《综录》171):“牧马官(mchibs-dpon)管交约高”; M. I. xii. 3 (托玛斯 II, 338 - 3 《综录》413):“牧场长官(tshar/tsher-dpon)邦古参。”^⑨虽然这里的牧区在哪里尚不得而知,但牧区无疑是受到吐蕃当局重视的,故有专门送粮食给牧区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所能提供的牧业及其产品供给显然不能满足吐蕃人在西域期间的需求,于是有对牧场及水资源的争夺。M. I. viii. 3 (托玛斯 II, 377 - 1; 《综录》342) 记:“(草场)划分定界后,选了证人乞力郭和乞力则。部落不让牲畜去水池饮水,并责备放牧人,欺骗守池人。一次,驴驹及牲畜……” M. Tāgh. c. ii. 0017 (托玛斯 II, 351 - 1; 《综录》373) 云“宇结向部落酋长乞力玛吉禀报:住在此地之于阆住户及吐蕃住户,他们在草场方面

① 73 RMF 26: 16, 汉译见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12号,第28页。

② 杨铭先生认为此木简是一道发给吐蕃米兰驻军官吏的命令,进行监视的目的,可能是督察生产、防止部落纠纷,便于粮食、物品的征收等,见氏著《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第23页。

④ 59 RMF (原编号6638,分类1367),汉译见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15号,第28页。

⑤ 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第36页47号木简注①。

⑥ 见 M. I. i. 30 (托玛斯 II, 369 - 1; 《综录》38)。

⑦ 见 M. Tāgh. a. v. 001 (托玛斯 II, 219 - 3 《综录》51)。

⑧ 见 M. Tāgh. c. i. 0053 (托玛斯 II, 216 - 1; 《综录》53)、M. Tāgh. a. iii. 0051 (托玛斯 II, 217 《综录》54)。

⑨ 关于吐蕃在西域地区所设畜牧业官员的研究,详见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军事、畜牧业职官二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

如若不和，请于阆人找些牧地，不另找一合适牧地不行。”除了针对当地原有社会生活方式而增设有相应官员外，前面提到的吐蕃本土的民事机构——堡寨，在进入西域后也带有了一定的军事后勤性质，成为吐蕃军粮的领授地。事见 M. Tagh. 0574 “从领属地区堡寨领取青稞四升（之收条）。”这种职能的增加与调整，体现了吐蕃人为提高其“海外”管理体系效率所做的努力，也反映其灵活应对新环境的作风。

四、西域绿洲地理环境下的吐蕃军事建制

西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既不同于中原农耕地区，也有别于游牧地区，早在西汉，以农耕为业的中原汉族军队开赴西域，便在西域实行屯田，兵农结合，以农养兵，为汉军在这里实施长期驻守提供了条件，屯垦作为有效的区域管理基础为历代中原政府所沿承。而对进入这一区域的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吐蕃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会对他们的管理方式与制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较吐蕃人游牧化程度更深的民族受到影响更显著，如长期生活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回鹘，西迁这里之后，社会生活方式就由天幕迁徙改变为城郭定居。^①绿洲地理对吐蕃的部落军事制度产生一定影响，对其作战体系、军事职官体系和职官管理方式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吐蕃的军事建设也因之出现了调整和变化。综上所述，可归纳出以下三种变化趋势。

首先，是军事战略意义上的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在以往军事部落联盟制的基础上，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出现了适应局部战略的军事锋线划区管理模式，与吐蕃王朝在河西、关陇、川康、西洱河地区一样，出现了节度使制度（khrom），即前文利用目前汉藏文献所能提供的节度一级军事建制体系的信息暂命名的“吐蕃西境四道节度”。

其次，是基层军事管理建制在绿洲邦国条件制约下的职能变化。在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周边的邦国，相互间既独立又关联，交通线成为沟通邦国与外界联系的命脉，职是之故，吐蕃人进入西域地区后，要想维持在这里的长期统治，控扼交通线是制约邦国间复杂关系以及大集团势力在这里争夺的关键。因此，节度制度之下的基层军事建制亦采用适应绿洲城邦及其交通控制特征的管理模式。吐蕃在西域绿洲邦国之间的交通道路上，基本上保留了固有的交通网络体系，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吐蕃在各驿站除设置驿吏外，还安置斥候，在驿递功能外，又能兼顾对交通路线的军事控制。

再者，是为适应西域生活环境而补充更多给养方式所引起的管理职能调整。西域农业绿洲分布于沙漠边缘，各绿洲面积有限，周围环境恶劣，又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贫富有差，有的地少居险，有的粮产尽管丰盈，仍不能保障吐蕃军队以部落为单位的群居群牧生活方式，吐蕃军事部落制集行政、军事、生产于一体的模式在这里难以存在。善于学习的吐蕃人在占领西域地区后，多利用西域绿洲有限的资源与条件，增加军事补给方式，实现其占领目的，职官管理系统也因之而发生调整与扩充。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① 杨富学 《唐宋时代回鹘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On the Islamization of Central Asia

Lan Qi (1)

Abstract: The ages from 11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3th century is the period of Islamization of Central Asia. From 7th century to 8th century , Islamism was introduced to the places of Khorasan in the western of Central Asia and Transoxiana in innermost Central Asia. From 10th century to 11th century , with the help of Karahan and Ghaznavid Kingdoms , Islamism spread southward and eastward , resulting in the converting to Islamism of the residents in western Xingjiang , China , central Afghanistan and along the Indus Valley. From 11th century to 13th century , Islamism had been in every aspect of Central Asian society , even becoming a lifestyle. On three aspects , i. e. , material culture , political system and ideology , this paper analyzed Islamic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Central Asia; Islamization; Karahan Kingdom; Ghaznavid Kingdom; Arab

A study on “Registered Residents” in the Han slips from Xuanquan Yuan Yansheng (8)
Tibetan military system towards the Western Regions after conquest Zhu Yuemei (18)

Abstract: After occupied south edge of the Tarim Basin , Tibetan faced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new community life , which influenced seriously their military system. Historical texts and ancient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Dunhuang suggest that Tibetan military 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resulted from their military forces regionalization and collectivization gradually , on the basis of both their “three troops” and military tribal alliance which were set u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ibet foundation. It consisted of four routes Khroms , being parallel with Hexi , Guanlong , Chuankang and west Erhai military commands. The root organizations under Khrom adapted to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mode of traffic and oasis city securit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army was rationed by ways of soils distribution , property registration and unified grain offering , etc. and the bureaucracy and its functions were modified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ibet; Western Regions; military system; official system

Conflicts between Mongol’ s nomadic patrimonialism

and Han’ s centralism and its influence around Yuan Dynasty Gong Haifeng (27)

Abstract: Around Yuan Dynasty , there were severe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al Mongol “nomadic patrimonialism” and Han’ s “centralism”. Emperor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carry out centralism , while nomadic patrimonialism had already deeply rooted in all the Touxia’ s (kings , emperor’ s sons – in – law , merited officers , etc) mind. From Ogodei conquered Jin and Kublai established Yuan , until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 although Yuan government had adopted various measures , these conflicts still remained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Yuan Dynasty , which is also the reason for the “the merger of Mongol and Han” in Yuan Dynasty.

Key words: Nomadic Patrimonialism; Centralism; “Wuhusi (a tax)”; Touxia; Darughachi; the merger of Mongol and Han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ct – Village system

of Xinjiang under Governor Sheng Shicai Chen Yun Zhang Hao (36)

Abstract: Sheng Shicai carried out his administrative system , namely district and village system ,